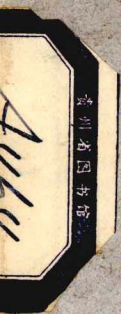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論調查研究

第一部分：了解情况是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是黨決定實際政策的根據。調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後才会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頁）

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况，成

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6页）

（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95页）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

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会有。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調查，調查社会各階級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負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具有对中国社会問題的最基础的知識。

.....

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对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实际相联系。“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經被人譏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議論，提意見，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敗。因为这种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过是无知妄說。我們党吃所謂“欽差大臣”的亏，是不可勝数的。而这种“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对，“理論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論。”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論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見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繼續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789——791頁)

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則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还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观实际狀況的浓厚空气。“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叶，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認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眞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眞理。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796——797頁)

胸中有“数”。这是說，对情况和問題一定注意到它們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为一定的数量，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貧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謂富农，何謂富裕中农，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則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須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

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須有个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問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1444頁）

在領導方法上。方針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須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車騎通訊、口头談話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已組織和領導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須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賬，总的糾正。这样損失太大，而随时糾正，損失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須力求密切，經常注意明确划清許做和不許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頁）

第二部分：調查研究是为了找出事物的規律， 并且应用这些規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頁）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

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3頁）

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0頁）

……有一種方法是要學的，學習的時候要用這種方法，使用的時候也要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布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則”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者是當着指揮員

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和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指揮員怎樣去處置。

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地會辦和比較地不會辦之分罷了。事情要求比較地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地多打勝仗，反面地說，要求比較地少打敗仗。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凭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

起，到战局終結止，这是又一个認識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計劃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認識，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軍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時間內認識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規律，解决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这一認識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这一种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規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仅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須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174頁）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時說出来的一句话：沒有把握。为什么沒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內容和环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沒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談到这类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覺

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8頁）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1943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发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借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990页）。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1933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

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說：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規律，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嘩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飞。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

.....

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結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

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書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这种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学的結論。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嘩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碼应该具备的态度。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2頁）

第三部分：調查研究必須应用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場、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頁）

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这种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頁）

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点的界限。記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則就会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須經過細致的研究和分析。我們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5頁）

有些同志，从資产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出发，錯誤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險，他們劝我們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馬，一个要上馬，却是表現了两条路綫的分歧。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第30頁）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輩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調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說，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我用开調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岡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調查”，一个“长岡乡調查”和一个“才溪乡調查”。开調查会，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調查和井岡山两县調查，找的是各县中級負責干部；寻鄖調查找的是—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門管錢粮的已經失了业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調查时該县的一个小獄吏。兴国調查和长岡、才溪两乡調查，找的是乡級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調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还必须自己口問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頁）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关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頁）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5—866頁）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这就是說，群众有伟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間，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訴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問題，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組織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6頁）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暫時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問”，要善于傾听下面干部的意見。先

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問題的时候，除軍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見，他們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見，必須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見。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錯誤意見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給以批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1443頁）

对于任何問題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列宁說，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頁）

在我們糾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績，認為完全錯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沒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頓了党的組織，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現在又糾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績么？对于我們的工作，